

改革之声

(上)

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安徽省科技信息服务总公司

一九八四年五月

新
舟
PDG

编 者 的 话

当前，我国体制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进程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将把我国体制改革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全面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我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飞跃，广大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历史性改革浪潮。今天，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这股强劲的改革浪潮，已开始由农村冲向城市，由农业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并迅速地延伸向祖国的南北大地，改革之风已吹遍广大工矿、企业、商店、学校、机关和社会的每一角落，其速度之快，民心顺应之强烈、反映之大，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会带来社会生产力新的飞跃，并相应地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当前，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新的技术革命浪潮正在迅速兴起，并将促使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变革。这场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四化建设来说，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迎接挑战，就要抓住时机，进行体制改革，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要振兴中华，实现四化，把农业战线上正在发生的奇迹，迅速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就要把妨碍我们开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新局面的老观念、老框框、老办法破除掉。随着改革的逐步实践和发展，党中央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全国的改革形势，正处于一个逐步高涨的新时期。

五月的庐阳，春意盎然，但改革之情浓于春意。由全国知名的改革者邓旭初，步鑫生、温元凯等人发起，由安徽省科委和《光明日报》理论部组织的“新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五月五日在合肥召开，全国各地的改革志士，在古城合肥欢聚一堂。他们交流了改革的实践和经验，共展了未来的宏图与理想。为迅速传递会议期间的大量改革信息，我们编汇了这本《改革之声》，奉献给广大读者，作为内部参考和借鉴。

由于掌握资料有一定局限性，编辑整理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所限，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改革本身又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动态过程，需有一个逐步实践、逐步成熟、逐步完善、逐步科学的发展过程，文中错误疏漏之处必然难免，还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

《改革之声》内部征订通知

大力推进体制改革，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是振兴中华，富国强民之道，当前全国改革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为了向大家传递改革工作的新信息，我们特以今年五月初在合肥召开的“新的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的材料为主，并选入了近一年来报纸上发表的有关改革的文章，汇编成《改革之声》，分上、下两册奉献给广大读者。

《改革之声》是集先进单位和知名改革者经验之大成，内容丰富，有理论探讨，有各方面改革的情况介绍。两册50余万字，共收工本费2.60元（包括平寄邮费），订购单位和个人，请将购款邮汇至合肥市 巢湖路145号 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情报室。

如订购30册以上，可信汇。

开户银行：安徽合肥支行

账 号：1089430

收到款后，资料随即寄发，报销凭证随书寄出。

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
安徽省科技信息服务总公司

1984年5月8日

封面题字：安徽省省长王郁昭

目 次

一、“新的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大会发言 录音整理材料（未经本人审阅）

（以发言先后为序）

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杨海波同志的讲话·····	(1)✖
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主任温元凯同志的发言·····	(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同志的发言·····	(13)
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朱雅轩同志的发言·····	(14)
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同志的发言·····	(20)
杭州交叉技术应用研究所所长金宝庆同志的发言·····	(28)
安徽宁国液压密封件厂厂长夏鼎湖同志的发言·····	(34)
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同志的发言·····	(39)✓
广东深圳特区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梁宪同志的发言·····	(43)
上海机电产品对外咨询公司经理陶祖骥同志的发言·····	(52)
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厉以宁同志的发言·····	(5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崔鹤民同志的发言·····	(63)
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同志的发言·····	(68)
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同志的发言·····	(71)✓
河北沧州地区经委主任王宏烈同志的发言·····	(76)
江苏人才研究会会长彭涵民同志的发言·····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同志的发言·····	(85)
江苏无锡县堰桥乡党委书记倪品良同志的发言·····	(97)✓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陈春先同志的发言·····	(100)
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副经理李凤政同志的发言·····	(102)✓
安徽六安县教育局孙成城同志的发言·····	(105)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桑新民同志的发言·····	(109)
中央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孙方明同志的发言·····	(113)
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袁振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118)
《光明日报》理论部鲁淳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127)
温元凯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129)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科委主任刘广才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131)

杨海波同志的讲话



杨海波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

同志们：

新的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合肥开幕了。首先我代表安徽省委、省政府对这次盛会表示衷心地祝贺，并对来自全国各地立志改革的先进代表和中央机关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各兄弟省、市前来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表示热烈地欢迎。这次会议在合肥召开，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最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改革之风正激励着全国人民，人心思改，改革势在必行。当前形势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涌现出成千上万个像步鑫生、邓旭初、陈庭元、温元凯这样的改革先进代表，必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掀起改革的势头。这一形势将对我省的改革工作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次学术讨论会议，根据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的题目，来进行探讨。小平同志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得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基本的结论，这是改革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总的题目下，耀邦同志对改革问题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方针，也是这次学术讨论会议应当遵循的。

根据以上精神，我们安徽省委最近正在进行的整党对照检查，实际上也是抓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政治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在经济上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我们省委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在安徽开创的农村生产责任制这个体制改革的新局面推向城市，推向各个方面，继续克服“左”的影响，立志改革，以整党来促进经济，以经济的发展来检验整党。

根据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在整个改革中，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当前，从我们安徽省具体情况来看，首先要把县以下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虽然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但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矛盾，我们主要的要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县以下的经济搞活，依靠“两户”的发展来促进农村的两个转化，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加强城镇建设，从而使整个省的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现在我们安徽同江苏的差距很大，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江苏的乡镇工业及县级以下的经济发展势力比较雄厚，他们已经达到160亿元，而我们安徽现还不到20亿元。如果不把县以下的经济搞活，就不能改变近60个县吃财政补贴的现状。因此，首先应当从安徽是个农业省这个特点出发，把农业抓起来，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促进乡镇工业的发展，加强中小集镇的建设，形成一个以中等城市带动各个县城及星罗棋布的乡镇工业的布局，这是个战略性的布局。根据我省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状态，我们确立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办法。对于这样的体制，我们应当有个长期共存的概念。特别是县以下的，要把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以及联合经济大力发展起来，要克服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影响和限制集体、搞垮个体的“左”的做法。我们省委讨论并研究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县、市和一部分人民先富裕起来，允许冒尖，不怕冒尖，这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律。我们要克服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思想，克服过去那种“不富担心，小富放心，大富疑心”的“左”倾情绪的影响。

在整个机构体制改革方面，我们首先要求省直机关，进一步为企业松开“五花大绑”，更好地为基层服务，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林业、交通、税收以及整个经济管理的体制上、政策上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有的部门正在讨论和准备将它所管辖的企业下放，以更好地发挥县、市综合经济的优势，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对本部门过去所发的文件，所规定的制度进行全面地检查，对不适应当前整个形势发展的一些规章制度加以改革和调整，并且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和章法。

在流通领域，我们对供销社体制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改官办为民办。有的地方由全民所有制改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让农民当家作主，促进农业的两个转化。我们的商业工作应从整个官商当中解脱出来，树立商品生产观念，促使生产和流通的同步发展，建立多种渠道、多种成份、多种形式的流通系统，减少不必要的环节，运用经济规律来搞活商品经济，更好地为发展商品生产服务。

另外，在对外开放和引进方面，过去我们的胆子比较小。最近，经过这一阶段的整党学习，我们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我们准备借鉴特区的某些经验，从我省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地掌握，考虑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一些不设特区的特区政策。譬如，我们的黄山市，准备把它建成安徽省对外联系的窗口，可以到香港招标，吸收外资来建设黄山，发展旅游事业。最近，我们与江西省共同利用外资，准备共建核电站。有些城市要扩大对外贸易权力，如芜湖市和安庆市要扩大对外联系，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欢迎国外华侨和外省来我省投资，开办企业。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已和我们联系合资经营开发煤炭的可能性。

在教育改革方面，我们学习了上海交大的经验，现正在召开高教改革会议。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设想和尝试。首先，准备以合肥为中心，建立科研教学基地，这一点是中央早就定了的。现在，经过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同意，第一步准备把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联为一个整体，以便把教育、科研、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准备在合肥利用大学的优势，把科大、安大、合工大几个方面的优势共同结合起来，打破部门所有制的界限，共同搞好教学、科研工作，以得到共同提高。这个联合的道路是适应当前整个科学向综合性、互相渗透的方向发展的。过去，我们也发挥了各个大学的优势，办了联合大学。合肥的联合大学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其它城市也效法办了联合大学。总之，在教育方面，我们促进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体制的发展。今后，我们将继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这次会议，学习各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推进我省的改革工作。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总方针。在这方面，我们的步子应当迈得大一点。最近，中央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新的精神。小平同志视察特区以后，准备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个大政策。这不仅对发挥沿海优

势，促进沿海地区尽快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这刚刚是个开始，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放。据说，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进一步开放的措施。中央领导同志指出，一个特区的发展，一个经济区域的开展，一个扩大沿海城市的权力，将促使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个新的突破。在对外引进方面，与外商谈判要搞蚂蚁政策。就是让外商来了，尝到了甜头，这样，后面就会跟着一大批蚂蚁，源源不断地来到。现在外商对我们最大的意见就是办事太慢，效率太低。中央领导同志也提到，不要什么事情都搞到北京来办，要扩大地方上的自主权。在重点选出以后，要采取择优支持的政策，可以使某些单位，某些组织，某些地区，某些公司基本上脱离现行的体制，使其具有特别的条件，有专门的外汇，专门的投资，可以单独对外。总的来说，这也是在国家计划总的计划指导下的一部分，但不受管理计划体制中很多具体规定的限制和束缚，并提出对内、对外申请审批手续可不按现行程序办事，要有高度的自主权。像这些思想都是继续对外开放的思想。小平同志也讲了，今天我们对外政策不是收，而是要继续开放。

在对内搞活方面，主要是松绑政策。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有些小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但经营管理办法可按集体所有制的办法来进行管理。小企业放开了，国家就可以集中精力办好大企业。除了有条件的可建立一些地区公司外，所有的企业都交给所在城市管理。并提出，可以考虑中央各部主要是抓行政管理，有些企业可以下放，只有部不管企业了，才能谈得上各个部的合并问题。过去几年，我们小化肥的发展就没有部门来管理，发展得很好。让企业部门超脱一点，有好处。有些公司、托拉斯设在哪个城市，就由哪个城市来管理，现在要坚决实行权力下放。过去有一种迷信，好像只有我管才能管得好，别人管就不放心。现在我们体制上的最大毛病就是部门太多，头绪太多，在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怕乱，对如何搞活经济考虑得不够。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要给企业扩权，层层少拿一些权，使企业真正有自主权。今年必须在提高企业的活力上做文章，这就是从分配入手，解决企业分配权的问题，分配权不解决，企业就没有活力。中国的事情不要怕乱，有大的计划，也要有小自由，才能有竞争，活了我们才能够发展生产力。

在实行奖励方面，中央明确规定了奖金不封顶，这样，可给企业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些都是推动当前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很深刻的革命。当前我们的改革应当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这是衡量我们各项改革的主要标志。万里同志最近指出，允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允许不改革。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会有成功，也允许有失败，失败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可以更好地前进，但是改革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共产党人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凡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都应当吸收和推广，凡是不符合于新的历史时期发展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应当勇于抛弃，勇于冲破。有些文件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现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了，必须进行修改。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可贵品质，我们就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意改造主观世界。改革就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而又能动地改造客观事物，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当前的实践，并且随着不断地实践和发展，又取得新的感性知识，

（下转第13页）

温元凯同志的发言



温元凯同志在与代表交谈

同志们：

我受会议主持人和发起人的委托，把对会议的要求和我们的几点希望谈一谈。

首先，我们希望把这个会开得活跃一点，昨天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讨论了怎么样开好这个会议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改革的会议，我们首先就讨论了怎么样改革我们的会风的问题。这次会议，来了那么多全国各地热心和支持改革、宣传改革、实施改革、研究改革的同志，那么多的同志都是非常忙的，到这里来都很大的希望，希望得到更多的有效的信息。所以，我们这个讨论会怎么样把它开活，我们昨天对会议的议程作了修改，我们要求大会的发言一律不超过一个小时，而且我们要缩短大

会，增加小会，增加讨论，要求每一个发言者尽可能谈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报纸上发表过的、有材料的基本上就不再多讲，可以发材料，大家看材料。我们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一个学术讨论会，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动员会，或者是一个经验交流会，甚至是一个反映各地区的情况，甚至是告状的会议，不希望把它开成这样，这样的话，我们的会议可以开得更好。现在是信息社会，要增加反馈，对会议的要求随时可以反映到大会里面来，随时修正，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那么多同志对会议的期望。下面，我的发言题目叫“立足改革，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高度地重视当前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和第三次浪潮正在对我们和将要对我们形成的冲击。

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九日，赵紫阳总理发表了关于研究世界新的工业革命和我们对策的重要讲话，胡耀邦同志几次对这个讲话作了重要批示。这个讲话目前在全国、全党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提出了一个对我们“四化”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七十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尤其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高度的发展，生物工程的实用化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海洋工程、宇宙工程等新技术的关键性的突破，正在酝酿着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和由此而形成的第三次文明浪潮的一个冲击，我们要高度地认识和重视这一个冲击将对我们四化提供的无限广阔的机会，然而，同时又是非常严峻的一次挑战。我们都知道技术革命正在世界性的范围里面作为重要的推动因素而促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有可能称之为产业革命的变化，而且将形成生产组织和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要高度地认识到，实际上当前迎接这场新的技术革命，它的含义将远远超出技术的本身，因为经济基础变化了，生产力的水平变化了，当然就会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的变化。我们都知道，这次新的技术革命使我们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生产力的飞跃，而且将产生一个不断变化的产业结构，它使知识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且使知识、信息、人才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一种关键，我们的改革要完全立足在这样的

一种形势下来研究，来讨论，而且，要使我们的着眼点，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考虑，适应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尤其是下面五个对我们的“四化”建设比较有密切关系的趋势：

第一个就是信息社会的形成。当然我们在这里应该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第二次浪潮文明还没有充分来临的社会，所以在这个趋势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实际上经历的并不是象欧美国家所谓从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而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着的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进化，信息社会的形成，使我们社会的一系列的问题都要随之而变化。首先，要提高对于信息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一点，只有在近一、两年内才始开注意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信息和能源、材料一起鼎足成为当今社会的三大技术支柱，但是，我们对信息在生产、经济、社会，包括我们各个个人事业的发展中的作用的认知还是有待于提高的，从我们人类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也就是说信息的搜集阶段，信息的整理、分类阶段，以及信息的应用这三个环节上，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而且有非常多的薄弱的环节。譬如说，我们直到现在为止，各级领导，各级机关，各个部门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信息的搜集和信息的整理、分类的机构或者人才呢，这就是我们非常缺乏的有了这样的机构和人才才能对我们各级领导的决策，科学化的决策提供非常好的信息基础，尤其是经过整理和分析的信息基础。

第二个趋势，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分散到集中，又重新走向分散的趋势，那么，当然，国际上现在在讨论的所谓新趋势，是重新走向分散，走向由少数科学家组织一些工人、职员组成了称为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国情下，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同时也要注意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趋势，因为第二次浪潮文明，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集中化的趋势，我们的很多传统产品、名牌产品，非常畅销全球，但是，我们的规模做不大，我们很难成为大气候，尤其在经济方面。怎么样使一个名牌产品成为全世界性的，就像美国的可口可乐一样，汉堡包一样，能够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组成供销网络的一个跨国公司、超级公司，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需要研究的，要鼓励我们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产品能够畅销世界的大企业家，但是，因为我们当前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我们在实施实际上是第二次浪潮的文明的过程中，应该已经开始注意到第三次浪潮文明对我们的冲击，所以，也就是同时要注意形成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问题，尤其在这个方面，在改革的过程中间，要进一步松绑，在体制上保证和促进鼓励形成小、收益快、周期短、投资少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从区域经济向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将非常清醒地看到，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一体化的趋势。一个国家政治、军事是有国界的，文化、科技、经济是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将看到我们是处在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战争中间，在我们要走向这一个趋势的过程中，我们当前最紧迫需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有国际眼光、有全球观点的企业家，能够走到舞台上来做买卖，谈生意、谈联营、谈合作。

第四个趋势，就是我们的社会正要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管在经济、文化、教育的领域里面都出现这样的趋势。多层次、多元化地办教育、办科研、办企业，而且从理论探讨上来讲，已经开始探讨不一定就是所谓国家经济就一定比集体经济先进，集体经济就一定比个体经济先进。耀邦同志去年在全国个体和集体的先进分子代表

大会上也讲嘛，什么叫光彩，什么叫不光彩，凡是对“四化”作出贡献的都光彩。

第五个趋势就是两个三类产业结构比例变化的趋势，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的发展，将从第一部类产业向第二部类产业、向第三部类产业转化的问题，以及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的问题。那么，在我们中国目前的形势上来讲，当然，尤其是84年1号文件的发布，农民走向商品流通，向广义的服务行业的转化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另外，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间，我们在中国的不同区域也将采取不同的对策，譬如说，我们现在应当看到，我们中国从客观上来看，毕竟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拿我们安徽省来讲，也是一个缺少资金的省份，所以我们怎么样有可能一方面抓资金的集中，抓重点工程，抓所谓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些传统产业，象建筑、钢铁交通运输等等，另一方面，在这个同时，注意鼓励形成所谓周期短，投资少的，效益大的比较高级的技术产业，或者被国外称为朝气蓬勃的朝阳工业，在政策上优惠，在各个方面给以鼓励，在一系列的包括象税收、投资等等，人才流动，给予优惠，才有可能在中国扶植起一批能够在世界舞台竞争的高技术产业。而且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所谓高技术产业面前，我们中国和发达国家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我们，象安徽省这样的穷省、落后省和上海、江苏这样的先进省也同样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鼓舞，而且是应该具有很强信心的，关键在于决策。我们应该非常高度地认识到，当前正在进入的信息社会，针对我们社会的一系列观念、做法、包括我们体制的改革，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就从深圳的两句口号来讲起吧，我昨天请教了蛇口工业区的同志，他们全蛇口工业区就是一句口号，就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感到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以后肯定了这句口号，但是我们也要指出来，这个口号对我们当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这仅仅是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口号，我们在这里还要提出符合于第三次浪潮文明和更高的生产力的水平的口号，就是“主意就是金钱，信息就是财富，人才就是资本，而且是最最重要的资本。”如果这样来讲，我们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一系列观念，包括我们的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研究，用人的关键等等，也必然就要随之而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刚才讲的几个趋势，拿人才来讲，用什么样的人来担任我们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要从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经济，我们当前特别紧迫需要的就是要有一大批有国际眼光、有全球观点的企业家型的人才。所以我有的时候给青年同志作报告，我就讲，现在我们社会上有一个偏见，一提人才呢，就是科学家，一提自学成才呢，就是数理化，实际上我们当前最紧迫需要的人才不是我们这些数理化的专门人才，我们国家当前最紧迫需要的人才和管理人才。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最杰出的青少年、中学生去报考管理系、经济系、法律系，这些我们当前最紧迫需要杰出的人才。而且，对人才的要求，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也就提出新的标准和新的要求，我们应该非常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的教育也是非改革不可，我们现在的大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这样说，大部分是性格内向的书生型人才，而这样的人才是不适合将来越来越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样一种形势要求的。所以，我们通过在全国提出和推动创造学的研究和创造教育研究，就提出了培养创造型，有开拓型人才的标准的问题。我们提出，作为一个高等院校的学生，应该培养自己科学研究的能力，发明创造的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获得信息和情报的能力，口才和演讲的能

力，文字写作的能力，以及社交和社会活动的的能力，只有培养这样的开拓型人才、创造型人才，我们才有可能造就一整代能够适应的新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形成它的干部基础，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另外给大会有一个材料，上面有更详细的分析，在会上就不再多讲了。

第二个问题，谈一谈对我国体制改革的势态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改革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当前，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头，从更高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认为改革正在我国形成一个越来越不可逆转的势头，那么它的关键，是由于经济改革的成功，要看到这一点。改革的一个最大的突破是在农村责任制的成功，我们说农村责任制的成功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打开了一个漂亮的突破口，而且，当前这个突破口正在开拓它的缺口，正在使改革的势头从农村引向城市，我们经常说，在中国的改革形势下，形成了所谓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前沿，如果说我们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过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话，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使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话，那么这一次改革的浪潮，从农村现在正在卷向城市，将使中国从落后走向繁荣富强。今年以来，改革正在形成两个新的突破口，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城市工商科教责任制的开展，这一方面，我们省委连续发了几个文件，贯彻城市工商责任制，明确提出把农村的责任制的做法引向城市，打破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这三个现在严重阻止城市改革深入的，被称作新的三座大山，使我们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可以松开绑来，像农民一样的精神抖擞、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这是第一个突破口；第二个突破口，就是14个沿海城市和特区，由于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以后，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办法，包括深圳特区的一系列的办法，所以，我们现在从全国的势态分析来讲，第三次浪潮首先拍击的是中国漫长而又曲折的东海岸，在那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文明，我们和一些同志在分析的时候也探讨现在我们全国最落后的、经济上排二十几名的省份，有这么几个：河南省，山西省，包括我们安徽省，我们注意到这些省份，黄河流域，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人民的发源地，为什么这些地方现在经济最落后，而现在经济速度上得最快的就是东南沿海，所以很多领导同志看了深圳特区以后，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那是一套整个新的文明，我们称之为工业文明，实际上所谓像河南，原来所谓中华民族发源地的经济落后，这是象征着一代文明的衰落和沿海新文明的兴起，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看。所以我们讲，在改革的过程中间，当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现在改革，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迎面而来的势不可挡的一座冰山，这个冰山的水面上的那个小角，可能并不很大，但是在冰山下面的冰疙瘩已经大到势不可挡的程度。因为只有经济改革的成功，广大人民进一步在富民政策号召下，走富裕起来的道路，这样的改革就会成为不可阻挡，这样的改革才能使我们政治上的改革不可逆转。当前改革形势是非常好的，首先就好在党中央号召我们改革，一而在，再而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不改革就没有希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允许改革不成功，不允许不改革。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全国的改革事业获得新的势头，而且，当前尤其是赵总理提出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的讨论，在全国和全党引起了我们改革的紧迫感，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引起了一点危机感，应该非常清醒地看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中间，是不大有危机感的，产生危机感的时刻非常少，我们经常有一种洋洋自得的集体自大感，我们的坐标系老是找到我们的过去，老是仅仅比我们的过去，这在当前越来越开放的一个国际社会中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坐标的参照系

转向国际，我们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紧迫感，甚至讲危机感，这一点我们感到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民和日本人相比的话，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日本民族一直就非常注意有危机感，有一种集体的危机感，所以日本能在战后军用工业打掉90%，民用工业打掉60%的废墟上，创造出五、六十年代经济起飞的奇迹。在形势好的同时，我感到我们每一个热心和积极宣传改革、实施改革、支持改革和研究改革的同志也都应该非常清醒地看到，改革事业所将要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应当尖锐地看到我们现在生产水平的发展，它的要求和我们的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不协调，我们现在一部分落后的生产关系正在严重地压抑和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就拿对外开放来讲，我们如果引进外资，像我们最近要引进计算机的装配厂，我办了一下，我发现简直是难得不得了，橡皮图章起码要盖几十个才能够办成事情。我们经常讲我们浪费时间，浪费财产，浪费财富，浪费人才的问题，我们现在也要非常尖锐地提出浪费机会的问题。为什么赵总理的讲话里面非常强调要抓住机会，迎接挑战的问题？这就是信息社会，我记得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就曾经讲过，一个人的才能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是不是善于抓住迎面而来的机会。但是，我们现在的体制，包括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包括我们几十年来形成的弊端，使我们不可能很快抓住时机采取行动。香港一个商人到我们这里来访问，看中了什么产品，一个电话回去，明天就以可组织生产，我们能这样做吗？我们那一个企业要搞一个新产品的話，我看审批手续没有三个月就下不来，所以这实际上对我们提出了尖锐问题。还有，对于改革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希望，今天也来了很多理论战线上的同志，我们应该看到在改革问题上理论的研究是落后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我们不少研究改革理论的，还停留在那种经验式的讨论上，而不能从我们广大改革的事业的生气勃勃、生动活泼的实践中引出带有关键性和有战略性的口号、提法，我想包括像农村责任制的改革理论研究，现在就做得不错，譬如说包产到户，大包干，多少人，尤其在我们安徽省，反复了五年，多少人心有余悸地提出来，这不是资本主义吗？这不是从集体化倒退吗？那么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就非常尖锐地、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农业责任制的成功，是我们中国农民，广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这就是解放了我们的思想，现在非常需要在这一系列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上，在理论上进一步使广大的、包括改革者在内的人，进一步地改变东张西望，提心吊胆、心有余悸的局面。

第二，我们认为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或更宏观的角度，从哲学、从历史、从社会来研究中国的改革所将要遇到和将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非常冷静而清醒地分析我们中国社会，包括几千年以来这个社会的特征和它的性格，我们不可能违背这些规律，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你想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你能做什么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怎么做的問題，而是你只能这样做的問題。我们可供选择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自由度，比我们在客厅里面议论的自由度要小得多，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由于几千年以来，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惯性非常大，情性非常大的所谓叫超稳定结构型的社会。报纸上的文章也可以慷慨陈词，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动作的，所以我们有些企业家讲，叫五花大绑，我的一些老朋友说，你现在的这样的改革得到很大的支持，好像很一帆风顺。我说像我这样得到非常大的、各级领导的支持的改革，我给他们打一个比方，我只不过是这样的动作，就这里是捆住的，但是很多同志已经相当羡慕我能这样动作（做动作），很多同志就只能这样动作（做动作）。

作），还有的同志大概就只能这样动作了（做动作），这就是当前改革的势态，是我们的现实，我们是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个现实的。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中国的改革，我们要非常注意分析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而且要看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是有很多优良的品质，譬如说我们的勤劳，我们的聪明，有才华，我们的吃苦耐劳，但是我们今天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间，也是有很大弱点的，也是有很大缺点的，这种弱点和缺点目前也正在严重地阻碍我们的改革事业、阻碍我们在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奋起直追。我个人感到至少有三个民族性格的弱点，是严重阻碍我们开拓我们的改革事业的，尤其是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第一个就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庸之道的哲学，中庸之道是我们几千年来的大国粹，随大流，怕冒尖，反对冒尖，甚至发展到打击冒尖的不正之风，“枪打出头鸟啦”，“出头椽子先烂啦”，“人怕出名猪怕壮啦”，“树大招风啦”。有几次我们和美国教授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把“人怕出名猪怕壮”翻成英文，那些美国教授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人怕出名？为什么猪怕壮啊？这猪壮不是很好吗？我们和他说这是中国的文化。所以昨天在预备会上我们讲，深圳来的同志，他们明明创造了非常好的经验，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但是他们害怕见两类人，第一怕见记者，第二怕见理论工作者，实际是这种心理的一种反应。我们的民族如不去掉这样的心理的话，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产生活力的。我们所以也讲东方式的嫉妒心理，这也是目前改革者处境为什么那么难，这要从哲学的高度看，不要去纠缠在那一个人反对你，那一个人不赞成你，要从社会的角度，哲学的角度，西方人嫉妒，它生产力的发展，嫉妒的结果是带来了竞争，竞争就带来了活力；我们东方式的嫉妒，你行我不行，他不去想他也行，他就想怎样把你整得不行，不是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甚至给你编什么桃色新闻，最后把你整下去。什么都整不下去的时候，就跟你讲，你这个家伙骄傲，群众关系不好。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社会上带有非常大的普遍性，“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成了规律，这样实际上严重地阻碍了我们。为什么万元户要把钱埋起来，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钱埋起来的话，它一点效益都没有，存在银行里还有利息，而且通货膨胀的话，埋起来还要贬值的。现在农民扩大再生产，怕投资。最近我还碰到阜阳有一个万元户来找我，他原来就把赚来的几万块钱用塑料布包起来，埋在地底下，用水泥砌死，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传达了以后才把水泥砸开，才把那个钱掏出来，这与国家现在资金短缺的势态是何等尖锐的矛盾！我们国家缺资金，农民手里有游资，但他不能扩大再生产。第二个民族性格上的弱点就是保守、墨守陈规。当然我们应该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最不保守的，现在党中央的领导人是最富有革新和改革精神的，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由于惯性大，历史悠久，所以往往是带有保守、墨守陈规的传统，首先都要看一看有没有先例，祖宗有没有讲过，本本上有没有写到，包括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的理论工作者的论战都要朝本本上找根据。一句话，本本上如果没有出处的话，这心里就很不踏实，也容易被别人攻倒。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活的东西，是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就要研究，就要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还是作为神学，这是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列宁也说过，唯物主义要随着自然的发展改变它的形式。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个僵死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呢？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讲过计算机嘛，小平同志视察了上海以后讲，计算机发展要从娃娃开始，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这是在议论新的技术革命。我们长期以来因为是一个封闭体系，是一个锁国

的状态，所以，现在党中央提出开放以后，我们不少人在心理上有一种不平衡，尤其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平衡，不是把洋人看成洋大人，顶礼膜拜，就是把洋人看成洋鬼子，盲目排外。在青少年中间出现的就是盲目崇洋媚外，什么都是外国好，什么都想到外国去。但是，对我们社会上比较保守的、比较年长的、比较左的、流毒比较大的，凡是外面来的东西都是很可怕，前不久还不是把深圳讲得乌烟障气？说成灯红酒绿，好像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一样。昨天蛇口工业区的同志来就告诉我们，公安部最近在深圳就对他们发表讲话，公安部的同志经过研究以后证明，深圳的犯罪率是全国最低的，这就是非常好地证明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虽然跑到那里去好像衣服穿得花花绿绿，但是那里的效率是全国最高的，创造了所谓“深圳速度”这个专业名词。我们最近长江路西段就是出现了“深圳速度”，这个“深圳速度”在中国的改革上将成为一个专业名词，这是深圳建设者的最大光荣，对我们的最大贡献。那里的青年工人，在上班时候，小平同志去视察，他们头都不抬起来照样干他们的活，我们这里哪一个单位能做到？我们这里打扫除弄得不好就要搞它三天，为了来迎接领导同志的视察。所以，我们要看到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文明，我们过去往往有种想法，我们学习欧美发展中的国家，要学他们的技术，学他们的科学，包括学习他们一点点管理经验，但是对他们的文化都感到非常的玄乎，非常害怕，尤其是前一阶段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一下子把什么外来的东西都搞成精神污染，搞得人心惶惶，自己吓自己，造成很大的混乱，中央下了一系列的文件、讲话、社论，才扭转了这么一个趋势，实际上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文明和技术是不可能一刀切开的，怎么可能仅仅学技术而不涉及到文明的问题呢？我们在学习欧美工业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科学的同时，必然就引入管理，管理就带来文明，而且我们对文明要进行分析，这也是理论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有些东西不能随便给人家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难道从英国、美国学来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吗？举个例子来讲，专利法，我们老认为专利法就是资产阶级的，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骂了三十年，现在才发现专利法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生产力水平发展以后的一种evolution，不是一种revolution，evolution是进化的意思，revolution是革命的意思，这是生产力水平发展，要求保护发明者，要求用经济杠杆来促进技术走向经济，专利法的宗旨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过去就稀里糊涂地反了几十年。还有像优生学，等等，类似这样的东西，包括现在在反的某些东西，恐怕我们隔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又会认为我们今天又犯错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以要进行分析，我也举过一些例子，拿穿衣服来讲，我们这个民族是非常保守的，深圳市的一位负责同志，是思想非常解放的一位干部，而且大会小会必穿西装、戴领带，号召服装上的革新，但是在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视察的时候，他也穿了一件洗黄了的中山装，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这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传统的巨大的一种制约力量，这种制约力量如果不能够解脱出来的话，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有生气，不会有活力的。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深刻地看到历史的教训。1860年中国和日本同时派遣官员到欧美去考察，日本官员当时非常注意考察欧美的文明、文化、体制，而中国官员认为鸦片战争打败中国是他们有坚船利炮，所以我们的官员去考察人家主要是考察人家机械枪炮，当时德国的首相卑斯麦就断言，如果这样的话，不出三十年，日本人就将打败中国人，后来果然不幸被他言中，仅仅三十五年以后，甲午海战，日本就把我们的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这是历史非常沉痛的教训。因为日本民族在贝利少将打开了他的门户以后，它所向西方学习接受的是整个西方的工业

文明，而我们中国直到现在，往往在头脑的深处还抱着孔老夫子那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受整个工业文明，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要宣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实际上人家干了几十年，这是工业文明，这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如何打开改革新局面的问题。

我们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的改革是在哪些方面打开了局面呢？这个我想不多作介绍，主要的就是内行明白人当家，实行人才流动、聘用制，管事、用人、理财的三位一体，面向经济、社会，构成一个开放系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提高行政工作效率。作为我们科教改革，有三个宗旨：第一个宗旨，就是要改变科技教育和经济、社会、生产发展的严重脱节的现象；第二个，使我们知识分子有可能像我们农民一样，他们的生产力和积极性来一个解放；第三个，要进一步的切实提高、改善尤其是科教战线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年骨干的生活待遇、他们的工作条件、健康状况。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步有那些考虑，怎么样在当前全国改革的形势下能够打开改革的新局面呢？我们认为改革在中国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所要开启的是一扇非常沉重的历史掣门，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我们已经非常不容易取得的改革势头，如果我们过于急躁，不冷静，不够稳健的话，一头撞在这扇门上，想把它撞开的话，那么，你碰得头破血流，门却纹然不动，因为这是由于惯性很大， M （质量）很大的原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非常注意寻找能够开启这扇沉重的历史掣门的杠杆。有三个杠杆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经济杠杆，就是我们全党已经统一认识的，我们现在全党都要抓经济效益，要更进一步地在工矿企业扭亏增盈，改变过去、像步鑫生同志也讲过，你贪污二千块要坐牢，但是你浪费几万元、几十万元可以照样逍遥自在，甚至照升官的都有，这样的状况。另外一方面就是各个方面都要讲经济效益，讲经济效益的这一个观点不但是在企业界里，不但是在农村，这已经比较明显，现在就是要慢慢引向工交部门，引向科教部门，将来办教育事业，办文化事业，办新闻事业，包括将来的机关都要讲效益，讲效率。所以，我们就提出来大学不仅仅应该成为科研中心和教育中心，大学应该成为三个中心，还应该成为经济中心，大学要朝财团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中国的“硅谷”，叫科学、工业园区。交大邓书记和我们都有非常相同的看法，我们就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们大学现在老是只伸手向国家要钱，大学应该自己有本事去找钱，找什么人？找产业部门，包括找深圳，他那里有的是钱，找步鑫生这样的老板，是不是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构成新的称为叫大学、研究所和产业部门的新的神圣同盟。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我们今天终究又重新把口号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现在提成可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民、地区、企业先富裕起来，形成叫富民政策，打破平衡、打破平均，包括可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先富裕起来。我们也感到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的一个趋势，就是需要鼓励一批有才干的科技人员、干部，甚至文艺、理论工作者向企业家的方向发展，培养企业家型的科学家，科技人才。我们也经常注意比较我们中国和国外的第一流的学者，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部分第一流的学者是书生型的学者，而国外却是企业家型的学者，他们一般都能说会道，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第三个呢，就是构筑一个有不同层次，不同梯队的班底，形成一个一个世界队。我们现在不是没有能人，我们个别与他们比较的话，我们丝毫不比人家差，我们的素质训练不比人家差，而我们就很难成大气

候，很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大师，成为形成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中心，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学派，这里面就有个体制的束缚的问题。第二个杠杆呢，就是观念现代化的问题，就是看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实际上是封建色彩的观念弥漫的一个社会里，建设一个符合信息社会要求的一个技术大国，所以我们感到，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对我们危害深的话，我看不如说封建主义的东西对我们危害更深。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国家实际上在改革的道路上还需要继续发展，第二次浪潮文明，也就是说要建立起符合工业化社会所要求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还有一个需要讲的，信用观念。信用就是最大的资本，不能失信于民，要讲究信用，包括我们的政策稳定性，也就是这种信用的一种标志。不能朝令夕改，一年三变，每年改革的气候春、夏、秋、冬都不一样，一会儿行情看涨，一会儿行情看落，这样就会使很多人感到寒心，很多人感到没信心。第四个观念就是价值观念，譬如说，像深圳的同志，他们来参加这个会，他们讲他们来也是做买卖的，这个话粗听起来有点刺耳，为什么？做买卖！士、农、工、商观念，在中国，三教九流做买卖是最末等的。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严重地阻碍我们。我最近给青少年推荐了一本书，我推荐青年同志读一下，美国著名的石油大王、企业家哈默博士的传记，叫《超越生命》，我们过去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教师、家长给青少年宣传了那么多的科学家、政治家、革命家、艺术家的传记，现在是该向青少年宣传一点企业家传记的时候了，现在是该我们的作家给我们的企业家大写特写，写这样的书，写这样的戏，写这样电影的时候了，君不见《乔厂长上任记》一下就获得全国短篇小说的第一名？！这说明时代在呼唤着人才，时代在造就着人才，他们同样是当代的英雄，要树立这样的观念。第三个杠杆就是要坚持开放的政策，不但要对国外开放，而且，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把开放的观念进一步拓宽，就是整个要实行对外开放。因为，在信息社会里面，机会是偏爱于那些有智力准备和内外开放的地区和国家，这个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有力地启用这些杠杆的话，我们将一定能够使我们的改革稳步地，稳中求快地，健康地朝前发展。另外，我们感到在改革过程中间，还有很多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小会上进行更广泛的探讨，譬如说吧，怎么样来认识改革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关系，那么中国改革的特点，非常明显的就是既有自下而上又有自上而下，明白人需要更高一层明白人的支持，也只有明白人才能大胆地、放手地任用明白人。另外，我们注意到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合适的一个改革的设想、一个改革的方案，还要有合适的改革者来进行推行。我们的改革不但有可能失败在反对改革的人手里，也完全有可能失败在不明智或者是一些冒失的改革者的本身的手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的微观活力是照旧的，但是宏观结构和我们微观活力仍然是有矛盾的。而且改革是一个大系统问题，有些局部问题，譬如说现在发奖金就有一个问题，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你如果价格政策不相应变化的话，你这个改革就完全谈不上，因为价格根本使你体现不出效益，那谈何分配改革呢？所以改革是一个宏观系统的问题，所以钱学森同志最近也提出了一个系统工程的问题，改革的系统工程的问题。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要有一定的起步条件，那么最好的起步条件就是从我们现在最混不下去的地方和部门、单位进行突破，包括我们整个全局来讲，引起我们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的就是整个中国经济，不改革就没有生路。另外我们感到改革也要互相支持，改革者要

（下转第19页）



邓旭初同志在会上

邓旭初同志的发言

各位同志：

今天我首先代表交通大学对安徽省委，对《光明日报》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交大的改革还没有得到更多人承认的时候，安徽省曾经发表了文汇报刊载的文章，叫做“正兴起的改革曙光”，并且在这篇文章的前面，加了个很好的按语，此后，对交大的改革有更多的人承认了。

《光明日报》在交大进行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在改革还能不能搞下去，交大党委是不是还能领导交大的时候，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交大冲破困难，走向胜利，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对《光明日报》和安徽省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这两个单位又组织了这样一个大会，使各方人士能够聚会一堂，互相交谈改革的做法和想法，我感觉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还感到我们开会应该克服老套套，好象开头总要讲些感谢的话，我前面这样说不是老套套，我不承认是老套套，因为这个话我很久就想找机会说，但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个会嘛，我就说一下。另一方面，开会要讲效率，我是广东人，讲话南腔北调，讲十句能听懂五句就差不多了，效率很低。因此，今天我推荐我们学校教务长朱雅轩同志来这里讲话，朱雅轩同志是我们交大改革核心三人当中之一，在改革过程中他是一道出谋划策的，我们是一块共同战斗的，他非常了解情况，他是标准普通话，效果比我好；第二他年青，现在应该是青年人更多走上舞台的时候，因此我现在推荐朱雅轩同志讲话。

（上接第3页）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地向第二个飞跃发展，成为新的理性知识，这样不断循环往复地深化，就使得我们的改革一步一步地胜利前进。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必将大大地促进当前改革形势的发展，必将涌现出更多的步鑫生式的先进改革代表。最近，中央组织部的乔石同志也讲了，应当把这些改革者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促进四化建设的发展。

这次会议在合肥召开，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差，对同志们的接待、照顾不够，请大家原谅。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可向我们提出来，我们省委，省政府一定努力加以解决，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最后，祝大家在合肥生活愉快。